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60
24 September 1975

CHINESE

第三十届会议

大会

第二三六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福尔先生

(塞内加尔)

(副主席)

— 一般辩论〔9〕(续前)

发言人:

安诺生先生(丹麦)

拉贾拉南先生(新加坡)

布朗可先生(乌拉圭)

米尼奇先生(南斯拉夫)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更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安诺生先生(丹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作为一个杰出的国际政治家，这是你应得的荣誉。

接纳莫桑比克、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入联合国是持续和成功的非殖民化进程又一成果，也是走向会籍全面普遍的又一重要步伐。丹麦政府期望继续在本组织与大家一如既往，进行有效果的合作。

我国同其它国家一样，相信所有国家都应该是这世界组织的会员国。所有国家都应该在负担起《宪章》的义务时有机会分享积极参加联合国工作的利益。不论我国对某一制度或政策抱有同情或怀有恶感，我们反对任何违反《宪章》的企图，在联合国本身、联合国的机构或附属组织，把任何会员国除名或暂停它的会籍，也反对任何限制会员国权利的企图。和平与走向一个较有秩序的世界的进展需要在有组织的论坛上进行接触和对话。排斥和限制只会消除有用的接触，从而减少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联合国的三十周年带来难得的机会，可借以评价本组织当前的情况和瞻望未来。近年来，常有人说联合国已进入紧急关头和与现实脱节的状态。我觉得与其对这一问题作全面而终不会得到结论的探讨，倒不如借用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书导言里所表示的几点意见作为我说话的开端。他强调，两个关系未来的重大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第一，在我们所处的新环境中，主权国家能不能达成充分的共同意见并激

发必要的集体意志，使联合国作为维持和平的有效工具这一个原有的概念产生实际和持久的作用？ 第二，主权国家能否发展本组织的能力来处理所有国家目前所面对的、肯定不能孤立解决或由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单独处理的全球性问题？ 这是两个根本的问题。

要想对这两个问题作出积极的答复就必须具备某些重要的先决条件。 首先是要各会员国严格遵守《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和尊重《宪章》的条文。 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一位外交部长在这讲坛上曾以他自称是最起码、最没有创造性的提议结束他的发言：“让我们利用我们的组织，让我们实施《宪章》。” 现在我要冒昧地把这提议重提一次。

关于这一方面，严格遵守《宪章》划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权的规定是非常重要的。

维护《宪章》的基本原则是首要的。 同时，必须体会到，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的组织要以建设性的、不断的适应来对付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它的正常功能。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对话、谈判和合作为出发点，避免剧烈的对抗。 第七届特别会议的会议过程和结果证实了这点。

必须聚集各种意见，达成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折衷办法。在那些只有通过整个世界社会的参与才能取得可行的解决办法的问题，这样做法更是必需的。

我们是渴望进行合作的，但我们也坚决要求以秩序井然的程序和依据《宪章》来进行合作。 联合国从来就没有意思作为一个志趣相投的国家的组织，而是一个协调和迎合不同政策和不同利益的场所。 这并不意味着本组织就不应反映出根深蒂固的分歧和存在着的、但不可接受的种种不平等。 有理由心怀不满的事情如果没有公开申诉的机会，这组织就会丧失它的活力。 然而，我们应该尽力去了解大家的背景和动机，最后以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以专横的行动，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特别是应该避免使各专门机构带上过度的政治色彩。 尽管紧要 and 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我国深信这些组织的力量和重要性就是由于它们能够在客观的气氛中进行它们各自的任务。

假如我刚才所列举的先决条件具备了，我们就会走上使本组织真正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国际合作工具的途径。

联合国的主要工作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记录上显示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 局部战争是有的，但还没有世界性的战争。 不止一次，由于联合国的努力，或者至少是在联合国结构内进行的努力，一些有可能逐步升级的冲突都得到遏制。 战后东西方的对抗性关系已日益被各种形式的合作所取代。 在这里和在其它地方，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广泛深入发展国际合作，创造一个有共同利益的系统，使缓和的进程不至逆转。

埃及和以色列达成的第二个临时协议是走向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种动力必须保持，使在通过谈判，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和第 338(1973) 号决议所立下的人所共知的原则，能够在取得全面和平解决办道的道路上有新的重大进展。 关于这方面，请允许我同时重提一下，我国是遵守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通过的《九国宣言》的。

多年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不断努力，帮助创造有利条件以求达成基于两族人民同意的和平解决办法。 丹麦政府非常赞赏秘书长目前促进塞浦路斯两族代表谈判的努力。 我们将继续支持这种努力。 我们呼吁双方谨慎地、现实地和灵活地从事行动。

当我们考虑到在中东和塞浦路斯寻求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时，我们不应忽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这些地区也曾发挥的基要作用。 维持和平行动本身是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的。 这一点很明显。 但是，这些行动却能和缓冲双方之间的紧

张局面，从而造成有助于双方进行实际谈判的气氛。维持和平是发展和平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事实证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是本组织一项最具建设性和最有想象力的成就。

经过十年缓慢的发展，非殖民化进程恢复了它的动力。在南部非洲得到的进展和近几年来那些使前葡属领土在争取独立的努力中得到特别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发展中，联合国起了基要的作用。

然而许多非洲人还是在压迫的枷锁下。最确切的莫如纳米比亚。南非共和国继续支撑着它那个非法政权，阻止当地居民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在这方面，联合国负有我们全体必须尽力承担的特别责任。以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的方式对南非施加的压力不但不能减轻，而且应该加强。对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也是一样。尽管国际社会不断的谴责，这个非法政权还是继续对津巴布韦的非洲多数施行镇压政策，剥夺这些人作为平等公民的权利。

联合国在处理世界的经济事务方面正在日益负起新的重要任务。这是与本组织的普遍性特征相吻合的。

目前穷国与富国之间、资源丰富与资源贫乏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从这点出发在联合国进行共同的努力。所有国家都有责任积极参加工作，消除在世界人民中不公正的不平等和过时的特权。只有帮助较不幸的人民恢复他们的尊严和帮助他们在人类社会占有应得的地位，我们才可以希望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

为促进这目标，丹麦政府坚决承担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所订下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根据我国的国家计划，第七届特别会议在上星期通过的决议所设想的目标将会在这十年结束时达到。

丹麦的发展援助的一项特征是，约有一半是通过国际组织提供的。我国的捐献，最主要是给予联合国发展方案，支持了使联合国在国际发展合作扮演重要角色的努力。

虽然我们可以诚实地声称，过去的和在进行中的发展方案都取得了相当的令人鼓舞的成绩，但也必须承认，要实现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的目标，这些方案是不够的。

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七十七国集团所作建议的响应，包括洛美协定的签定，证明我们诚恳希望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指望有迅速和惊人的结果是不切实际的。适应新情况和接受必要牺牲的过程是有着它自己的节奏而且要受我们的民主决策程序的影响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需要耐心的谈判，在有些国家里，因为有互相冲突的利益得进行调解，也同样需要耐心的谈判。一般的经济环境是决定发达国家能否满足改革经济秩序的必要条件，从而决定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这种改革享得多少利益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七届特别会议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会员国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就增强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的能力的一个广泛和实际措施方案，定出了指导方针。这个成果是意义深长的，因为它是以真正的谈判，经过双方互相让步才取得的。这样表现出来的新的现实的态度，是令人鼓舞的迹象，¹给为了落实决议的内容现在必须举行的详细谈判带来了实际成功的希望。

在联合国领导下另一国际合作领域是正在起草中的新海洋法公约。这样一项公约只有在几乎普遍加入的情况下才会有它预期的价值。因此，在拟订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时，所有正当的利害关系都必须得到合理的考虑。

我们的组织不断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促进和鼓励对人权的尊重。在联合国存在的这整段时间，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见到了因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的理由而进

行的迫害，也见到了严刑拷打及其它种种公然侵害基本人权的行径。不幸的是，在各大陆上，现在的各种作法显示出侵害基本人权的新的悲惨证据。向在任何地方发生的这类作法作出强烈的反应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责任。

最后，我要简略谈到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世界人民创立了联合国。一个由人创造以服务于人的组织只有依赖群众的了解、人民对它的尊重和支持才可以成功。必须承认，滔滔不绝的花言巧语、懒散的行动、不尊重《宪章》和目光短浅的民族思想都不时削弱了群众对本组织的信心。

群众的了解和支持必须重新争取。我们必须发展节制与和解的气氛，以便进行真正的对话，也就是基于尊重不同的国家利益的对话。在寻求我们面对的世界性问题的共同答案时，我们全体必须有更积极的意愿来从事建设性的合作。

丹麦政府并不估低这种工作的困难程度。然而，假使我们大家都明智地、勇敢地和有政治意志地来合作，我们或许能共同发展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要使这组织成为更有效力的工具，以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是对所有 141 个会员国的直接考验。如果失败，那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拉贾拉南先生（新加坡）：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当选为第三十届大会主席。我相信你是第一位总理担任这个崇高的职位。你能够离开贵国三个月，这就反映出贵国政治稳定，也表现了你的自信心和政治勇气。这些日子，没有多少政府首脑能够连续离开他们的国家三个月而觉得放心。你当选担任这个崇高职位体现了你的个人品质；而且这也是卢森堡的光荣。身为一个小国的外交部长，我对于另外一个小国的代表当选为大会主席这件事同感快慰。

我国代表团又想向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以及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这三个新会员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们又期待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作为它的近邻，我们很高兴成为其加入联合国的申请的共同

提案国。

我又要向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华尔德海姆先生致意。他在过去十二个月履行他的任务，毫不倦怠；而这些任务有些是困难和吃力的。我要特别提出两个例子，来说明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贡献。第一，我想我们大家都感激他主持召开了塞浦路斯的两族间会谈。这种谈判进行了四个回合，虽然谈判好象碰到一些困难，但我请秘书长同双方继续努力，恢复谈判来讨论那些阻碍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和平持久解决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二，我要称赞秘书长在法国同几内亚恢复外交关系上所发挥的有效作用。

今年是联合国的三十周年。这一段时期是把两代分开的时期：战前的一代在联合国成立前已出生了，而且这一代大体上仍然在指导联合国的事务。另外的一代则在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后出生。旧金山后的这一代人现已进入中年，构成了今天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将来，指导世界大事和本组织的工作将落在他们手上。因此，任何有关联合国及其前途的讨论都必须对这一代有意义，而不根据这种逐渐消失的老人统治制度的古怪信念和陈旧偏见。

人们一般同意，经过三十年，这个世界组织已失去了大部分的热诚和活力，而且有些悲观主义者预言它会终于崩溃的。虽然我们不同意这些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但是联合国早年抱有的崇高希望已经真正地大部分化为乌有了。毫无疑问，由于联合国陷入困境，所以大会设立了一个专家小组来研究使它恢复活力的方法和途径。这些专家现在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报告，稍后我要论到他们大体上积极和有用的建议。

单使联合国的程序合理化和重整其机构，只有这两样还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集体组成联合国的一百四十一个国家对世界问题在理智上、在道义上和在感情上所采取的方法需要作出根本的改变。联合国的短处和弱点事实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不能够躲在“机构”和“程序”这种抽象概念里面逃避责备。

我们就是联合国。联合国不会比我们好，也不会比我们坏。

在我开始作出真正的自我批评以前，我要指出，有些人声言联合国没有一点值得骄傲的地方，没有联合国，这个世界还要好一些。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也证明了这个极端的意见没有道理。联合国的成就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可是，在推广教育上，在改善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上，在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上，在促进外层空间、世界海洋和维持和平等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上，联合国的记录都显示了很重大的成就，证明了它的巨大潜能。

有两个最特出的成就或许已经补足了联合国的很多失败，而且还有余剩。第一，千千万万的人民从帝国的束缚获得了解放；第二，一百四十一个国家养成了一种互相讨论和合作的习惯，不论方式是怎样粗浅和不完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那么频繁地、那么大规模地进行对话。

因此我们认为，解散联合国不单不能有益于进行更有效的国际外交，事实上反而会使世界陷入不可避免的悲剧。回复到传统的大国外交，或者由自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作出局限性的一致协作，而认为这两种方法可以恢复世界稳定。这种想法长期来说会使人类造成悲剧。事实上，今天除了联合国外，便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了。即使我们要抛弃联合国，但为生存起见，明天我们不得不创建另外一个酷似联合国的组织。这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来，我们有意无意地，甚至是勉强地，造成了一个真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年又一年地过去，这个世界只会更加相互依存，而不会不如以前那样相互依存。现代的科学和技术 and 它们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正常猛然地，而且常常是违反我们的意志和我们民族思想的本质地，将我们向着一个全球的社会推进。这个全球社会在今天已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现实。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和我们的社会问题都有全球的一面和国家的一面。粮食和燃料、人口和环境、核武器扩散、设立新的法律秩序来管理世界海洋的使用

及资源，将发达国家的资源和技能转让给较不发达的国家以及使较不发达国家迅速地现代化和工业化等，这都是需要各国和全球立即同时找出解决办法的问题。 单有一种解决办法是不够的。

总言之，世界只有一个，它的基本问题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现实。 但是指导联合国审议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却源出于一个大部分已经消失的世界和时代。 这些信仰是为满足十七世纪欧洲刚发现煤碳和蒸汽技术奇迹的需要而形成的。 当时的思想是环绕着种族优越的神话以及民族宗教的教化力量来建立的一种恐惧和恨恶外国的民族主义。 有人声称这种民族宗教是造物主最喜欢的。 正是这种思想包庇了征服和屈服低等民族的战争，认为这种办法是向较高文明进军的必需步骤。

这种十七世纪的思想仍然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仍然决定了我们在联合国的国际政策。 诚然，这些基本的信仰在这更为开明的时代都加上了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等等高调的粉饰。 但是揭开了这些外表的装潢，十七世纪的思想昭然若揭。 大概最令人悲痛的是，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虽然已经一度受过这种陈旧过时的欧洲思想的害，但是却那么容易地染上了它们从前的西方统治者有关系的仇恨外国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及宗教的傲慢态度。 我们怨恨强者的傲慢态度，这是十分正当的。 但是如果我们忠实而不自欺，我们也应当指责弱者越来越傲慢的态度。

联合国不能胜任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组织上的缺点和程序的不妥。 比较根本的还是我们企图用蒸汽机时代的民族主义来解决全球的问题。 更坏的是，我们强迫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遵守一种陈旧的越来越不相干的思想规则，从而替我们自己造成越来越多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一百四十一个国家纯然依照各民族的条件来制订全球问题的解决办法。 举一个例子，货币问题，就变得很难应付，因为这里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种时常是互相冲突的解决办法。

因此，使联合国获得新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接受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全球的社会

前进的事实，并且承认：除非我们将自己看作是世界社会的成员，否则我们的国内和国际问题会更难对付。这并不说要放弃民族的特性或是要牺牲基本的民族利益。这主要是一种新思维的问题。这种新思维使我们可以在全球社会的更广泛范畴内巩固和扩大民族利益。况且，这并不象听起来那么困难。一些大国已经能够设法在超越民族利益的机构内，建立了一种个人、团体和少数分子虽然互相冲突却都感满意的关系。

联合国有一百四十一个会员国。我们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而且常常完全相反。然而凑在一起，我们构成了一个全球社会。如果联合国要有重要性，要有意义，就应该成为有计划地培养和指导全球社会的工具；而目前我们却正在无计划地和无目的地创造这个全球社会。

如果我们要发挥这个作用，这个作用，据我们看，乃是联合国存在的唯一理由，那么，我要提出一些准则。

首先，我们必须摆脱这一种支配过去三十年的旧观念：利用联合国作为进行竞争和对抗的场所，目的在我们国内的听众和发泄隐蔽的公私挫折感。关于这点，在从前冷战时代首先开创这种不良传统的大国应受责骂。如果我们要找出全球挑战的全球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学习怎样使用联合国作为一个谈判和解决问题的论坛。既然采取打算分裂和羞辱会员国的策略，谈论国际合作是毫无用处的。

要着手于解决问题，就有必要有一种不同的心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由于一百四十一个会员国的利益各不相同。所以一系列的折衷解决办法，虽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好，但一个办法比一个好，可能是一条实际途径，领导我们达到终于满意的解决办法。

其次，我们必须摆脱流行的观念：认为以决定性多数通过了决议事实上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这个大概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大大地帮助了把联合国带到目前的可

悲境况。只要一个决议损害到持异议的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个决议就会被漠视。更坏的是，连那些含羞或被骗而投票赞成这种决议的国家也会暗中违反这种决议。通过一些我们知道会被无耻地破坏的决议，我们事实上是在帮助使我们的决议声名狼藉。

因此，重点不在由大多数作出的决定而在确立和解和共同意见。事实是，由于种种理由，本大会大多数表决的原则越来越发生疑问。有很多时候这个原则并没有成为和解的方法，而是进行对抗以便羞辱对方或是向反对者炫耀，暗示主动者比较敌方有较多的依附者。结果是，由于不断滥用，大多数决定已失去了它的效能。这些决定不单没有吓倒受害者，只加强了他不妥协的态度和迫使他作出反抗。

很多时候大多数的决定真正不是依照案子的是非曲直来作出的。那位不幸的被告很了解，法官和陪审团在审理案件和事实之前早就已经作出决定了。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事实和促使作出决定的案件往往同手头上的案件完全无关。由于他们就作出宣告的问题，毫不相干的事情作出秘密交易的结果，最后公开地作出了决定。

此外，有些决议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所以招来反抗，甚至对和平也有威胁。例如，任何决议，如果要求一个国家敌视一个同它自己无怨的国家，或者敌视一个同它非常友好的国家，或者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清算自己，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决议一定会遭破坏的。然而，大会却有时庄严地通过了一些这样的决议。

如果能够按照大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和执行决定，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认为本大会的会员国还不愿意这样做。少数派还没有确实知道多数的决定是按司法的公正作出的，还没有确实知道多数的决定是由有德行的人而不是由袋鼠法庭作出的。

因此，正如联合国宪章本身明智地规定的，本组织目前必须以建立共同意见为目的，我们必须使联合国成为“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不鼓励和扩大不和及冲突。

现在我要对联合国系统结构专家小组在题为《联合国推进全球经济合作的新结构》的报告所载的建议作出几点评论。我特别是指报告建议的，经大会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要求，或由上述任一机构十分之一成员的动议，经社理事会即可设立一个人数不多的谈判小组，对于在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的一项具体的行动提案或一些有关的行动提案达成协议；谈判小组的成员不宜过多，通常为十国至三十国，主要包括对主题事项关注的国家，不论是否经社理事会的成员国。这些小组的工作期间为一年或两年，由大会或经社理事会决定是否予以延长。

各谈判小组应将其工作进展情况随时通知理事会。在两年期间，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可以自由审议各小组讨论中的问题并可以投票表决有关这些问题的决议；但在决定是否将某一项决议提付表决时，大会和经社理事会应考虑到谈判的进展情况。

每个谈判小组都应由一位全时工作的主席主持工作，必要时，由人数不多，具有代表性的副主席团予以协助。主席和副主席都由秘书长提名并视成立该小组的提案源自何处经大会或经社理事会认可。全时工作主席的任期，与小组工作的期限相同；每个谈判小组的工作都应基于一致意见。当小组达成协议时，即应向经社理事会报告，由经社理事会采纳该项协议，或将问题发回谈判小组作进一步的审议，或采取它认为适当的其他行动。经社理事会核可的协议，可以送交大会，大会可以核可这项协议。．．．或将问题发回谈判小组或采取某种其他行动。

我国代表团觉得专家小组提议的协商程序有相当的优点。我们支持这些程序，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促成就主要的政策问题达成协议，而这些协议或许是其他的方法不能达成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要想达成协议，仅采用新的协商程序，这还不够。应该怎样进行谈判，这问题也是必须讨论的。

让我再提出四条原则供你们参考。第一条原则是，如果要任何谈判成功，大家

必须审查对方提出的最有建设性的提议。大家需要找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立场，以这个立场为基础。简言之，在任何谈判中，第一条原则的要素是从对方的观点观看问题，了解他要为什么利益服务，他工作上必须受的限制等。

我要提出的第二条原则是，在任何谈判中，大家不应该谋求优势。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谈判者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说过：“敲你的对手的头，你并不能够获得什么……倘若以为你可以强迫你的谈判对手赞同你这想法很荒谬。”

我供你们参考的第三条原则是，参加谈判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坚持要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的全部。参加谈判的每一方必须预备牺牲它的要求中的若干，作出退步和妥协。如果一方的所有要求都获得满足但另一方的要求一点也得不到满足，这就不会有成功的交易。双方都必须互相有得有失，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我提出的第四条，也是最后的一条原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定不可减少的起码民族利益。希望一个国家接受违反其不可减少的起码民族利益的任何提议是不合情理的。因此，参加谈判的各方必须设法体察对方能够作出让步的程度，或者甚至可以强迫作出让步的程度，以及一旦超过了若仍希望对手接受就不合理的一种限度。

上述提出的四条原则一点也不新奇，也并不是详尽无遗的。但是，如果要将联合国由一个拳击竞赛的场所变成一个谈判的论坛，这些原则应该传达一种带有新价值和态度的想法；这种想法必然会激励谈判和指导谈判者。

将联合国作为“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的一种远见，鼓舞了草拟联合国宪章的人。这种远见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贴切。我们面临到一些迫切问题的新议程：能源和核武器扩散，粮食和饥荒，人口爆炸和环境恶化以及南北对话。这

些全球性的挑战，只有作出全球性的响应才行。联合国是可以找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的适当论坛。第七届特别会议或者已经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换点。这个会议已经证明了大家可以使联合国发生作用，又证明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可以谈判。我们一定要决心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在开始时我说，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标志着自它成立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接管本组织的一个时期。较老的一代，即战前的一代，有很多事情要感到可羞的；最可羞的是上一次大战引起的无意义的屠杀以及以帝国的名义使千百万人受的征服。但是我觉得我们和他们都已经通过建立本组织、致力于永久取缔战争和帝国主义冒险从而补救了这些罪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一个精练和完善的联合国交给新一代，使联合国成为真正团结世界各国的可靠工具，我们的补救工作就不彻底。新一代就可以说：“把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上一代真不常见，他们并没有把什么东西隐藏起来，要我们事后清理。”

布朗可先生（乌拉圭）：乌拉圭代表团首先要向你，阁下，卢森堡首相兼外交部长，当选大会主席表示祝贺。贵国从过去承继了伟大的传统，在今天又充满行动力量。这个名贵国家的年轻而老练的政治家现在当选，我们要表示欢迎。

我们也要向阿尔及利亚的外交部长，阿布德拉齐兹·布特佛利卡先生表示敬意。他在本组织历史上特别充满活力的一年主持了联大的工作。

我们欢迎新加入的会员国——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这使我们更进一步实现了会籍普遍化的目标。

首先，请容许我做一个一般性的概论。这非常适合我们组织三十周年纪念。激励着乌拉圭参加本届联大的，正是同样激励我们在旧金山宪章上签字的精神。今天，我们一如既往地有共同的目标，并且要在与各国和平和合作的政策下，不懈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根据这项传统，乌拉圭希望国际共存要继续遵守法律，各国人民也能在此范围内，不受外来干涉而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为了对本组织诞生所根据的目标表示象征性的尊重和信仰，并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长期和一贯性的表示，我国政府在本届代表团的成员中派了两位当年曾参加那个历史性文件签字的杰出人士。

我不想按传统方式就议程主要项目进行逐条分析，而要照乌拉圭的看法；集中于最重要的一些国际政经的思想和事实。我相信这样会使一般性辩论更为深入，并使各国思想的本质更为明白。乌拉圭代表团将在各委员会中对每个项目发表它的具体看法。在此地，我要特别声明，我国传统的政治路线并无改变。和以往一样，这个路线可以表现一种超然独立和不归任何类别的立场。它的行动并不依照任何集团的需要，而要依照我们自己的原则对事实作出的忠实估价。

由于这个理由，乌拉圭将竭力反对任何利用联合国单位和机构进行任何宣传或鼓动任何意识形态占优势的企图。因为这种行动是违反宪章的精神和文字的，并且从政治观点看，它会破坏本组织的信誉，并使本组织不能有效地公正执行其受命

的崇高责任。

联合国的诞生，是为了使世界避免一次新的战争，是为了避免一次象当时刚结束的同样战争。那次战争的形态，那时的武器，造成大战的原因与动机，使派别联合起来的意识形态，各个胜利国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他国家的一般情绪——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现实和已知因素。

从那时起，到现在止，在经过的时期中，已经发生了许多显著和巨大的改变。今天，创始会员国看到，联合国的成员已经三倍于前了。大量的种类不同的项目牵涉到最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全世界人类深切愿望，使今日联大的议程大为丰富。意识形态的分裂和政治经济的权力常常循着诡谲难测的出人意表的途径来发展。

许多那时完全无法预见的冲突爆发了。这些冲突的过程，一般而言，绝对没有感到宪章规定的管理机构发挥了良好的影响。即便是我们今日恐惧的或可能遭受的战争，其种类也已有所不同。也许，正是由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了如此深刻的改变，使我们对那些无法纳入传统范畴的新事实不能有正确的了解。世界大战让路给冷战，而冷战又让路给共存。这里的每一阶段，都是本组织历史上的里程碑。

今天在政治领域内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缓和了。我国当然充分支持减少紧张局面和避免原子灾难的危险这一目标。我相信各国都一定会毫无保留地、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一目标。但是，我们必须申明，这样的政策的范围是有限的，仅限在大国之间的关系。它肯定地减少了核战争的危险。甚至减少了大规模传统战争的危险。但是对于期望和平自立而不受外国干涉的几十个中小国家而言，这个政策并不代表着具体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缓和并不会消除强权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事在今日都有着不同的形式；战场改变了，所用的武器也改变了。从前是国与国间宣战，现在已经过渡成为越过边境、进入边境在国境内不宣而战的战争。不再只是为着传播理论从事宣传的一回事了；而是利用一切媒介和资源的综合行动了。

恐怖主义和颠覆行为是这种战争的具体表现。它们阻碍着发展的进程，并损害了每个社会配合其特点价值来决定其前途的政治主权。这两个东西相互密切地连系起来，几乎是一个东西，并且联合成为一种国际活动，不分界限，一天一天传到更多的国家里。它们现在还得到某些国家公开的明目张胆的支持。

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活动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甚至影响到高度发达，具有最高的社会和经济水准的一些国家。它们不受繁荣和文化的阻隔。这是一种相同的毁灭性阴谋，在不同的区域里使用不同的政治幌子，适应当地的情况，而永远有同样的一种作为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的暴力和控制的强烈愿望。

尽管这种非人道和非理性的潮流有时声称它是向新社会改变的唯一力量，但它的行为却代表了倒退到一种过时形式的共存，并且必然成为每一个社会自由发展的障碍。

因此，我们应当力求清楚地认识一个事实：尽管有了许多宣言和协定，争权夺利的无情斗争就在同国家数目一样多的战线上进行；文明的原则和基本价值到处受着危害。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今日世界上最可怕的政治现象，更无法应付它所代表的挑战。

我国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出这些事实。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本身就经历到同样的活动。或许国际社会为了这个理由当时不能充分了解这种危险的规模和意义，认为正如某些歪曲和虚伪的宣传所声称的那样，它只是一些当地性的因素造成的。现在，我们成功地打退了向我们发动的强大进攻，在我们加强长期防卫以对抗其它类似企图时，我要向各国再度重复我们的警告，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反抗这种如不能立即控制就加以毁灭的明显政治目标为动机的恐怖主义者和颠覆者的真确国际恶浪。

我提出这些事实是希望获得大家的注意，因为这种表面的而且限于大国间暂时关心的国际和平是我国不能认为满足的。

乌拉圭希望国际法受到尊重。让每一个国家各尽其力，依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对共存这个艰巨的问题做出适当的反应。不要有任何人以别国人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审查者自居。愿大家都能尊重多种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不要有任何国家对它国进行渗透、颠覆、侵略或控制。

所有这些，不仅是一个起点；同时也是国际法的目标。如果不严格遵守，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中小国家当它们的自由受到缓和也无法防止的战争的威胁时亦将继续加强保卫这自由。

我现在要谈谈经济问题。在宪章签字时，经济方面最主要的事就是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怎样使经济恢复旧观。三十年以后，大家认识到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我们都在努力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为它们建立一个更平衡公正的制度。同时，我们都在努力，在最近的将来减轻目前危机造成的影响。

一九七三年尾，当这次危机的规模的初步迹象刚刚显露时，所有经济领域内的主要国际活动都针对着双重目标：一方面，寻求一个世界经济的全球性组织，另一方面，要帮助那些受到紧急情况影响的国家。

我要坚定地说，我国坚决地不同意于这些活动的取向和其一般进程的得失双方的结果。我们很直截坦率地这样说过了。

首先，一般而论，对抗的态度是普遍存在的。实际上，这种态度不能——也的确没有——引起任何具体的结果。如果我们试图奠定重建国际经济的纲领，所有的参与者必须有率直的、真实的和诚恳的共同意见，这，只有基于普遍接受的和由谈判得到的方式才能达成。

在国际组织中争取赞成某些具体决议的多数票，这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不够的，如果这不能直接导致具体和实质的行动，也仍然是不能获得我们的正当和重大利益的。在今天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孤立地通过的决议或一些敌对的决议是再也行不通了。任何问题，若不是由全体合作所产生的结果就不会有答案。

其次，改革整个国际经济秩序的观念若不是具体可行的和切合实际的，就不会对于最紧迫的一些问题产生任何效果。有时可能发生这种情形，而且的确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形，看来最有雄心和远见的建议会拖慢一些显然必需的而且由于性质的关系乃是任何未来秩序决不可少的步骤。关于一些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例如农业粮食，和人口的问题，显然不可能在世界经济的所有各个方面都获得全面了解。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基本的领域内同意一些令人满意的办法，必然可以事半功倍，促进各国的相互信任，并打开一条得到我们共同希望的综合解决办法的途径。

因此，我国建议集中国际努力于众所公认的应该优先的领域，基于广泛的政治共同意见以求达成解决办法，采取实际可行的措施。

现在我要谈谈在面对危机时采取行动的方法不妥。一九七四年四月，我曾在大会中解释了石油及其他原料价格上涨使我国受了怎样的有害影响。我那时还提到乌拉圭经济在一九七三年尾的一些令人鼓舞的数字；谈到当时的良好展望，但我又说到以新价格进口百分之百的燃料对我国经济无疑地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预测不仅适用于我国，而且适用于范围广大的进口原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幸，我们的预言已由有事实证实的，一年之内，拉丁美洲原油输入国的国际支付逆差成为以前的三倍。那时支付逆差数字相当于这些国家输出总值的一半。

另一个已经证实的预言就是，工业化国家会比较迅速地吸收这种亏绌，所用的方法是它们经济的多样化，它们吸引余剩资本的能力，和不幸地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进口采取限制性措施。情况之所以如此，不完全是由于采取了任何行动或没有采取行动，同时也是由于一些政府和人民无法控制的外在因素造成的。

那时以为国际社会对遭受打击的国家实施决定性支持的政策，当然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得坦白地说，为这问题召开了无数会议的工作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产生任何有效措施。国际社会为此目的所提供的资源数额绝对不足以应付需要。由于资源不足，许多国家不得不依赖条件经常极苛的商业贷款，以求弥补因油价上涨

造成的债务；就连国际贷款，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的石油贷款，也要在相当短期间还本，并得支付利息，因而增加了外债，结果就限制了可用为发展的信贷幅度。所有的额外资源都要全数用于维持正常水平的燃料供应，无法投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消极的因素。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已具体指出，紧急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的需要，并且列出一系列的标准来决定哪些国家应收援助。但是，在分配援助时，却仅仅用了国民平均收入作为标准，结果许多受严重打击的国家不能获得援助。显然这种标准决不能表示出每个国家受影响的程度。

在这方面，上周美洲国家组织已一致通过建议国际和地区的金融组织修改这项标准。按照现在实行这些规则的方式来看，以国民平均收入作为标准，拉丁美洲只有两个国家符合特别援助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由于危机而结果面临最严重问题的国家反不能接受专为应付危机提供的特别援助。

因此，我要申明我国对于标准的适用表示强烈的不同意。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标准不符大会决定中的规定；而且，很不幸的，由于其有限性质和漫无计划的性质对最贫国家的情况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认为这些最贫的国家现在没有受现有资源的帮助。对这些国家而言，大量资源应该以赠款的方式提供。

在这里我要说，把紧急援助用于解决长期问题的倾向掩盖了一项事实：资源最富的国家特别为最贫国家提供的援助，无论就绝对值说，或就真正数字说，都减少了。按照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目标，捐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的承诺并未实现。如果能真正做到这项捐助，则不但解决了最贫穷国家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例如，国际发展协会是以优惠条件提供收入最低国家的贷款的，关于该协会资源补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因新的石油价格而获利的国家的捐款不足，这不是为那些受目前危机不利影响最甚的国家提供的紧急援助所能弥补的。

这种倾向有更深的影响，超过了紧急援助分配的问题。有一个问题虽非直接由此而生，但却清楚有力地间接由此发生。这问题是：要想最贫穷国家获得发展是否应该降低其它国家的生活水平，不仅降低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降低经济、社会最有希望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

换句话说：是否应该减少一些较不落后国家的微薄进展，以便满足那些最落后国家的基本的无可置疑的需要？国际大家庭岂不是一面促进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获得进步而不同时阻止发达国家的进步？

不论在国际层次上或在国家层次上，我国都不接受阶级战争的理论或实践。相反的，我们相信，正是一种有想象力的建设性的和共同的努力，会维持并促进最先进的国家进步，同时也会促进落后国家有较迅速的进步。

这个意见不只是由我们政治和伦理信念产生的；也是根据我们今日经济的实际经验：在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不可能有任何孤立的解决办法。繁荣，如果要它持久，就必须使它广泛。

我还要谈到我们不能赞成的另外一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对于某些初级商品的输入强行加以限制，而这些商品对于那些受了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十分重要的。这事揭露出国际金融措施的不当。肉类的情况就是如此。美洲国家组织上周的会上已经就此问题采取立场，表示对这件事的深切忧虑，希望能解除这些限制。

因此就发生了下述情况：一些国家受到石油价格上涨的严重影响，而构成它们经济骨干的产品同时又遭到老主顾——发达国家——的阻挠而不能出口。不仅如此，这些发达国家还用津贴政策，减价和大量充斥市场的手段在其它市场上互相竞争。

这种复杂的布置在目前情况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无情地剥露出一个根本问题：国际社会尚未找到保证发展中国家重要出口稳定性的方法。没有稳定性的条件

就不可能储蓄或累积资本来作经济多样化的投资。任何就业政策也就因而难以确立。一切世界经济的规律都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幼稚工业不能不专心致力于效率和竞争的政策。然而没有把这样的标准适用于所有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结果，就是畸形发展和浪费。这样在世界的发达区域内，工业辅助了毫无效率的农业生产妨碍了取得其它区域中更经济地生产产品，甚至以津贴补助的方式在第三国家的市场上竞争。

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矛盾现象：经济规律并不较为灵活，可以帮助最落后的国家，而是，事实上，对于最先进的国家比较不严格。我们要指责这种不公的矛盾。

我们都很熟知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严厉法律和办法。然而，面对着消极因素这样同时累积起来，又没有任何减轻的情况，令人不能不怀疑促进发展的合作是否还有前途。

前面说过，毫无疑问，有必要把农业、粮食和人口问题列为最高优先的事项。因为这些问题除了有异常重大的经济意义外，还有更加重大的人道意义。最近我们听到许多呼吁，要求增加粮食生产以应日益增长的人类基本需要。这就让人认清了最惊人的事实之一。毫不夸张地说，这事实对于今日的国际秩序一面是控诉另一面又是挑战：这就是，正当有些人民在销售他们生产的粮食时，遭遇着严重的困难。同时另有一些人民却因为买不起粮食而挨饿。因此，在这些情况之下，不是缺乏生产能力；所缺乏的仅是一个协调供求的国际金融机构；一个国际机构，可以把例如在南半球以最低廉的成本生产的蛋白质带给各地亿万营养不良的人们。

我相信，我们如果集中力量于寻找这个问题的具体答案，就会帮助大家丢开抽象而迂阔的发言和文件，抛弃联合国“收文”，“发文”的手续，完成实际而杰出的人道主义的任务。

几年以前，当乌拉圭的商品贸易正在兴旺繁荣，前景还大有希望，那时我国政府建议设立一个粮食银行，作为同时满足收入最低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金融需要的

方法。我们采取行动是出于同全体贫穷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觉得我们有道德责任把我们粮食生产的自然资源以最广泛的方式运用，而不仅仅是用来为最富有的社会造福。今天我们重新提出这个比以往更迫切需要的建议，无论物质上或道德上，这项建设都是必要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去年在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的结构中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所建立的机构的业务失败表示失望。

我代表我国政府重申：我们坚定地打算在目前贸易条件和财政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增加我们的粮食生产。

联大最近的一次特别届会中通过了一个有关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决议。尽管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大体上都不赞成，但这项决议是有希望的。讨论的实质更具建设性。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共同的解决办法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想法。我们相信，例如美国代表团提出的已赢得其他国家赞成就是对于全世界利益有关的许多问题作深入处理的办法。七十七国集团文件是一个表示发展中国家看法的重要声明。有一个关于拉丁美洲金融安全网的建议提出来了，除了作为谋整个区域利益的制度以外，也可帮助提高那些以拉丁美洲为重要市场的国家的收入水平，改善那些国家的就业状况。

我刚才提到的文件所包含的一些构想也反映在最后的决议中，因此这决议也代表了在确立原则方面向前迈进一步。但是我很担心的是，如果推迟执行这决议，又如同时进行的事太多，这决议就很难实行，紧迫问题的解决就会延误了。而且如果在援助的分配方面还继续延用现在的标准——象我前面说过那样——我们现在努力倡议的国际行动就会在许多国家内都无法产生实际影响。

乌拉圭将支持在第七届特别大会中确立的各项纲领的实施；但是我们要对于与

目前情况重要方面有关的逐案解决的办法特别加以注意。我要提到几项更突出的问题，以求能对具体的解决作出贡献。

我国政府相信设一基金以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的办法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因此，我们要全力支持。我们应该在基金的管理方面采取很慎重的科学方法，以免制订一般性的规定而实际上排除了某些国家。

我国政府也同意这个信念：贸易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方法。因此，我们支持巴西提出的极有价值的建议：举行谈判来签订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协定。如果要扩大贸易，则关贸总协定中的谈判就绝对不可限于一些只对工业化国家有重大关系的事项。必须从这种谈判得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所应遵循的特别规则，订立这种规则时要考虑到东京会议所接受的非互惠待遇的构想*。

我们相信工业化国家的农业政策，尤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政策，和这些国家间缔结的产品协定，不应该透过保护主义政策来限制这些产品的贸易，不应该导致国际价格剧烈波动而损害发展中国家。关税应该修改，以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潜力，卫生的规章条例不应规定外国出口商比本国商人受更多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应享有稳定地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制度。

最后，我要提出我国已经准备参加出口和进口国家间的商品协定，以求更好地组织生产和贸易。这些协定不应该限于主要对工业化消费者有利的产品的狭窄范围，而必须包括对一个或多个生产国实质有利的每一项产品。

我国政府相信对话和共同寻求解决办法是应该采取的正确途径。乌拉圭正是在这个范畴内，本着这种精神，在不同的论坛上表示其看法。我们已经坚定地冷静地这样做，我们已经设法说明某些直接受这个危机影响的国家里发生的虽很突出而鲜为人知的实际情形。

* 副主席福尔先生（塞内加尔）担任主席。

法国总统本人认识到这种情况，在最近的一次发言中他说：

“至于一些产品少而价格没有上涨甚且有时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处境悲惨因为它们仍必须负担石油、食品和制成品价格上涨的重担。”

有些解决办法虽然本身显然很好，例如进入资本市场，增加出口，但就短期而言，却不切实际。为了得到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根据具体的标准，从目前的情况下手。我要本着这种精神，总结地说明我国政府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

工业化国家的贸易规则和政策必须修正，这包括取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商品和制成品的保护主义政策。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提供的资源必须增加以便捐给援助最贫穷国家的基金，尤其捐给国际发展协会。

国际收支状况受石油及其他基本进口品价格损害的国家必须受到帮助。分配援助资源的标准必须反映所造成的损害。

必须创立一个稳定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基金和缓冲储备。

必须以粮食银行形式设立有效机构，对农业提供奖励，并保证农业生产有经济条件，又保证最贫穷的人可以取得，应该缔结对一个或多个生产国有实质利益的各项和每项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基本商品协定。

在联合国体系内应该有适当的制度性改革，使国际社会的行动能够集中并更获协调，使那些受紧急情况损害最烈的和最需要援助的国家获得利益。

最后，代表我国政府，我要提出一个具体建议。这是有关提供经费给中级国家的，就是有关中级和较高级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国家中有许多是拉丁美洲的国家。它们却在最紧急国际援助的范围以外。应该为它们创立一个象第三业务一样的机构，可以称之为第四业务，用收取较高利率的特别财政文契来应付这些国家的巨大额外需要。如果需要任何补助，不妨限于减少该制度的管理者必须缴付的关税。所谓管理者就是那些按发展的财政需要而提供借贷基金的人，不论其为世界银行或区域银行。

今日的联合国正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运用词令，意识形态，纯粹浮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认为满足，或者我们要深入实质，深入情况的症结，共同寻求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和反映真正共同意见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方法显然比较简便，但可能导致缺乏效率，使我们在世界舆论中丧失信誉，渐渐地，使一切重要问题都同本组织脱离了关系。

第二条路比较困难，但它却是使联合国能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获得大家的尊敬和信任、达到三十年前的创始国和新加入的会员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目标与希望的唯一道路。

米尼奇先生（南斯拉夫）：我愿衷心地祝贺主席当选担任这个高职和责任。我有机会这样做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两国传统上一直在促进友谊和联系。我还愿向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表达我国代表团诚恳的感谢，他成功地领导了这些重要会议，使会议浸染了他的活力和他的国家的不结盟政策。

我极度高兴地欢迎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佛得角共和国。它们的加入联合国象征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解放斗争的新胜利，也象征一切国家有平等参与国际社会事务的权利。我们期望不久有机会在这里欢迎独立的安哥拉的代表。安哥拉现在正遭遇着极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外界因素利用安哥拉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不和与冲突所进行的干涉而造成的。

遗憾地，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入会，由于在安全理事会中，违反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立场和要求，所使用的否决权而遭到阻止。因此两个越南共和国未能取得会籍，而它们的人民却对加强联合国基本要素的原则作出了无以估计的贡献。

本届会议正逢联合国第三十周年。联合国的产生是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伟大斗争的结果，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要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压制自由、摧毁人类的尊严。因此，尽管联合国存在着反映当代世界矛盾的弱点，但它从一开始便具有了能表达人类追求和平、自由、进步的那些最深刻愿望的一切基本价值。

本届会议是在许多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期间举行的，例如：最近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关于人口、粮食、海洋法及国际妇女年的世界会议，第二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会议及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这些集会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人民为寻求史无前例的平等国际合作创造条件而参与的一致努力。不结盟国家对这一切为消除建立在武力、征服、剥削基础上的陈旧关系

和结构、以及建立新的、更公正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作的重要努力，作出了有决定性的贡献。

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特别指出不结盟国家对解决大会本届会议议程上的关键问题所作的建设性贡献。由于日益反映在共同利益和问题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世界的需要，不结盟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政策，或象利马文件所说的，成为有效力于独立、平等、和平、经济与社会进步、国家间民主关系的国家的积极选择。这也由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不结盟政策表示的兴趣所清楚地强调出来。

在利马，正象在从前的那些场合，不结盟国家所采取的立场是：困扰当代世界的那些关键问题不能在不管有多大实力的封闭的集团范围内来解决，而只有靠世界各国和人民间平等关系范围内的最广泛国际合作与分摊责任来解决。

我们很愿一切国际因素都充分领会利马的这项基本旨意。不结盟国家，作为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国际关系全面发展的一个普遍因素，已经承担了它们对解决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切的那些国际问题所应分摊的责任。它们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上所作的贡献再度证实了这一点。

不结盟政策为和平、平等、经济和社会进步所作斗争的战略的出发点是现实估计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一般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一切国际因素所起的作用，从而也是大国所起的作用和它们间的关系。这个战略还现实地估计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其中最大的特征之一是不结盟国家的出现和它们不断增加的团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日益反映在那些针对解决目前国际经济问题的活动中。

我们深信，没有一种解决国际问题的战略，可以不考虑到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它们的团结等国际因素而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的。

同样的，我们深信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对保障和平、促进更公平的国际关系及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相信任何想要破坏这种团结和一致的做法都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它们是在客观的、共同的愿望和利益之上，这种愿望和利益的比重总是要超过存在它们之间的分歧，或超过在特殊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分歧。

当今世界的特征是不断增加的极重要发展，它们反映世界上各种复杂进程，以及那些旨在通过平等的国际合作为解决国际问题创造条件的广泛而彻底的努力。

当今世界的特征是不肯向任何不平等和依赖关系妥协的各种力量的不断增加的活动。我们正在亲眼见到世界上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的产生，是所有各大洲人民为争取独立的民族的、进步的社会发展，以及为争取在政治的、经济的关系和结构上的具体改革所作胜利斗争的结果。

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的胜利、非洲殖民制度受到的致命打击、拉丁美洲国家为加强政治和经济独立的胜利斗争、以及在许多国家的国内关系上的民主和进步改革，都是不断地使各种力量的对比朝向有利于解放、进步、和平方面发展的重大因素。国际社会在认明与新的国际秩序有关的问题上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进展，并朝向它们的建立采取了初步行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成功结束对松弛紧张的过程给予重大鼓舞。

这些积极的过程和结果在某些程度上使人类离开世界战争，但它们还不足以为所有国家取得持久和平。世界上还有不同集团和其它形式的分裂，以及深刻的经济不平等和巨大的社会差异。以武力阻挠进步的过程、袒护干涉内政的行为、以及想把这种行为合法化的企图，正在加紧进行。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意图并没有减少，在有些地区甚至更为高涨。世界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发展中国家处的地位特别不利。军备竞赛继续不断。一些最危险的危机仍未解决，或者还在加剧，同时新的危机又有爆发的危险。缓和的过程还是有限的。

这种发展需要全体国际社会迫切而果敢地参与解决存留的国际问题，并建立更公正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这种关系上才能为所有国家找到稳定的和平与没有阻碍的发展。

南斯拉夫是一个欧洲的不结盟社会主义国家，对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杰出成就极为重视，因此我们也希望在本届大会中提请对该会议给予应有的注意。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所通过的最后文件不仅指出了在松弛欧洲的紧张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概述了其进一步加深与扩大到世界其它地区、到一切国际关系领域的条件。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赫尔辛基会议的发言中说过：

“现在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执行载于我们即将通过的文件中的那些决定上面……从而我们将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作出重要的贡献，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也启发了这个会议。”

我国代表团相信有必要从事坚持的努力，以保证载在最后文件里的那些决定将会被充分而始终如一地执行，并且成为国际生活的一个不可分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进行世界民主改革和克服在参加国的相互关系上及它们与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的关系上所存在的集团和其它分裂现象的一种创造性工具。因而，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与欧洲自身范围内关系的改变相平行，有必要保证欧洲对当今世界的进步与和平过程作出比前更有效的贡献。

南斯拉夫从一开始就致力于确保这个会议应该反映欧洲安全与更广泛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安全之间的密切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确保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国家应以平等和尊重所有各国利益的精神对解决发展问题和其它国际问题作出贡献。

南斯拉夫了解到它的责任重大——一方面它是赫尔辛基会议的参加国之一，一方面它又是将于一九七七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下次会议的东道国——要通过它的倡议，

为实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所制定的原则和立场作出尽可能多的贡献。

我要特别强调我国一贯地遵行睦邻关系的政策，现在因为有了该会议的最后文件，将借此更为致力于加强与邻国的全面合作。

我还想指出，我们希望赫尔辛基会议的文件将激励我国所属区域的各国更广泛的合作，更具体的说，就是巴尔干和地中海各国的更广泛合作。在南斯拉夫这一方面，它将努力为这种对这些区域的所有国家重要而有利的合作的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

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对下述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及塞浦路斯问题，非洲非殖民化过程的加速发展，反种族隔离和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朝鲜问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问题，印度洋区域的局势，裁军问题，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等等。该会议对一切在殖民控制下进行解放斗争的人民表示了团结，并强调必须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人民重建它们受战争损害的国家给予援助。

利马会议的所有最后文件都已作为联合国文件散发，并且秘鲁的外交部长，德拉弗洛尔·巴列将军，已经在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和本届常会上非常有力的提出了利马会议的立场和决定。

假如我要在这个最重要的世界论坛上提出南斯拉夫对我们本届会议议程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的观点的话，我就要把不结盟国家利马会议的那许多立场重述一遍，因为我国已在它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制定这些立场和决定作出了贡献，并从而将通过我国整个外交政策活动为它们的执行继续更为坚定地工作。

现在我愿谈一下我较早提及的一些危机和问题。

中东的局势是危害该区域和全世界和平的一个最直接的根源。以色列要对它不断侵略、占领及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政策负责，这是早已肯定的事。

假如以色列坚持它现在的作法，那就没有其它办法，只好采取决断的步骤，包括象宪章第七章中所规定的措施，来强迫它执行联合国的各项有关决议。

最近签署的西奈脱离接触协定代表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有可能成为一个建立持久和平的积极步骤，只要它能够加速完成一个朝向公正而彻底解决的行动，这项解决要建筑在以色列撤出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占领的一切领土及履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建立它们自己国家的权利——的基础上，这些都是保证该区域所有国家和人民独立和安全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步骤之后，不应该再有僵持，也不应该再长期的迟延朝向解决危机方面的后继步骤，否则中东局势又可能发生新的危险的恶化。

解决中东危机问题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的价值必须根据它对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民族权利所作贡献的程度来加以衡量。除非迅速朝向这个目标作出具体的进展，就不可能在永久解决中东危机上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正是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作出进展的事实，才引起最严重的关切。

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利马外交部长会议的立场，即不结盟国家应该直接和积极地承担寻求中东危机的持久和公正解决。

尊重和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及不结盟地位是联合国的一贯责任和关切所在。因此我国坚决地促请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不结盟国家在最近的利马会议上重申了它们对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完全团结一致。我们的出发点是深信这个问题的解决唯有以第3212(XXIX)号决议为基础才有可能，这个决议是大会所一致通过的也是所有直接有关各方所投票赞成的。这个决议代表着唯一通过两个塞族社区的平等、相互协定来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一般接受的基础。这是由不结盟国家集团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的。

关于这一点，进行斡旋工作的五个不结盟国家联系小组起了非常建设性的作用。同时，它继续活动，并在它的任务范围内继续愿意为这个目标作出进一步贡献。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与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都维持友好关系并属于相同地理区域的国家，并且，自然地，又是一个不结盟国家和五国小组之一，因此它从一开始便积极地致力于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持久而公正的解决。

尽管朝向确实铲除殖民制度上作出了重大的进步，但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力量为了尽可能保持它们的残余地位而坚持努力。这可以由下列事实证明：它们的介入安哥拉、它们秘密地或公开地支持南非共和国、支持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支持南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政权等等，常常有引起世界性危机的危险。现在有甚于从前，仅仅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进行一般性的道义和政治谴责已不再有效。今天有必要转向具体而果断的行动来打击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为了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可能，有效地援助各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取得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

人为的朝鲜分裂局势的保持，不仅否定了朝鲜人民统一的不可剥夺权利，并且危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了这些理由，我们支持不结盟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策，它选择在没有外来干涉下和平统一的途径。必须撤消联合国司令部撤出驻在朝鲜的一切外国部队、及创造条件使停战协定变为一项持久和平的条约。唯有除去一切外来势力才有可能创造条件使朝鲜的北方和南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联合声明所载国家统一三原则的基础上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正在通过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通过消除殖民飞地、争取对它们的一切自然资源行使主权，和争取最广泛的自由和平等的国际合作，朝向民族和社会解放和世界进步的现代过程作出优异的重要贡献。

这些区域的国家同时遭受着反对这些过程的各种势力的压力，它们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支持和表示团结。我们特别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军政府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以及支持巴拿马和古巴对它们的国家领土建立完全主权的斗争。

裁军的各项基本问题至今还是停滞不动，而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正惊

人地普遍加速展开，这些事实不仅令人对目前为止所取得的那些减少紧张的结果发生怀疑，并成为新的垄断和控制关系的根源，还使全世界不断地处于核灾难的边缘。归根到底，不扩散条约仍然只是垄断制造核武器与发展核技术的工具。严格遵守这个条约的规定的只是那些不转让核武器和核技术的签字国。由于一种趋势，要使裁军谈判不受联合国的影响，把它们转移到其它机构或双边渠道，尽管能取得部分解决，却不能代替联合国的作用，这就造成了极端不利的后果。

我国代表团深信现在已是时候，我们应扭转这个趋势，进到解决这个影响国际关系一切方面的重大问题的转换点。尽早停止军备竞赛，开始普遍彻底裁军的过程是对一切国家都有极重大利益的。因此我们，连同许多其它国家，请求尽快迫切地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假如仍然受到阻挠，我们认为就有必要象有极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出席的利马不结盟国家会议所要求的，举行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大会必须采取主动，负起宪章所交付的责任，不能再因为几个大国的看法不一致而陷于瘫痪。

第六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朝向基本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方针。由阿尔及尔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四次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作出倡议而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代表着为执行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议所作的努力。

第七届特别会议的结果，整个来看，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一方面改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一方面符合全体国际大家庭的利益。第七届特别会议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的立即和潜在意义在于这些决议建立了优先次序、指出了具体的行动途径、规定了谈判的方式和拟定了执行许许多多措施的时刻表——这一切都建筑在那些直到昨天还不为某些发达国家所能接受的原则和标准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上的作用是具有特别巨大的重要性的。

我们愿意相信第七届特别会议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打开了新的一

页。 这些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第七届特别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如何及何时实现、有赖于我们将如何及何时超越这些协议，进向充分执行第六届特别会议所达成的一切基本决定，关于 这些决定，发达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

虽然在某些极其重要方面所取得的结果仍距离发展中国家所建议并正当期盼的结果很远，虽然几乎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原则差异主要还是关于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但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以共同意见通过的文件本身便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上协议的构架和基础，以便在联合国系统内从事进一步活动，走向达成载有执行义务的具体协定。

念及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最密切地注意已达成的协定的执行情况，这件工作应涉及联合国中与处理该文件所论及的各项问题有关的所有机构和组织。 这些活动的结果首先应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而集中于在大会里。 根据我们的意见，这些结果应在大会第三十一届常会中加以审查。

鉴于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在法国倡议下，为审议能源、原料和发展问题而即将召开的巴黎会议应设法配合这届会议的各项决定。 由于它在实现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最重要规定上可能会起的作用、由于它对所有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可能会有的影响，还由于涉及到联合国在经济领域内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使得它必须关切第七届特别会议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

鉴于局势的重要和复杂，大会在第三十届常会中，照我们的意见，应该采取下列行动，这些行动都应该是作出具体决定的主题：请求联合国系统内所有各机构，在它们的活动中，对载于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文件中而属于它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给予最高的优先次序；要求它们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为了在巴黎会议与联合国之间建立一个不可缺少的联系，向该会议的参加国发出请求，把会议工作的结果，通过经社理事会经常告知联合国；取得一项了解，使巴黎会议中所可能达成的一切协定要得到大会的审议。

联合国的三十多年经历给予我们一个机会来审查这个世界组织所走过的路程。

我们一直认为联合国是建筑在平等和尊重一切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全球性国际合作的最适当工具。联合国继续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解决迫切和长远的国际问题作出贡献，这是格外重要的。对南斯拉夫来说，它在履行本世界组织所面对的任务上已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正如杰出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本组织年度报告的很具体的导言中所恰当说明的，联合国的作用和效率的加强，最密切地关连到，也最直接地依赖着各会员国的政治行为，及它们对根据它们的会籍和本组织通过的各项决议承担的义务所采取的态度。宪章本身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尽管有某些缺点，甚至有一些不合时代的条款，但它仍然是调整所有各国间关系的一个基础。但是，由于一些会员国的行为，许多决定，甚至一些极大多数通过的决定，不能执行，这是联合国的最大缺点之一，它削弱了国际公众对它的效率的信心。

只要某些会员国正是依据实力从事行动，施加压力、威胁、干涉内政、侵犯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或领土完整；只要它们还占有外国领土、否定或危害人民的自决权利、执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或侵害基本人权；只要它们不承认各国以主权方式处理它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的权利；以及只要它们还是以不管任何方式维持或建立外国控制和霸权，就不可能有符合宪章和主权平等与各国权利平等原则的国际秩序出现。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和反抗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和反抗，联合国在国际合作的许多方面已取得重大成果，这是没有疑问的。由于接纳大量新国家为会员国、非殖民化、和在许多危险地区中的建设性行动、由于在新的领域里推展合作、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它对缓和紧张的过程所作的具体贡献，以及由于它的人道活动，这个世界组织从基本上改变了它的性质、形状和作用。它朝向取得普遍性的巨大进展和联合国内各种力量的新关系，使益见多加审议和逐渐解决那些最重要和尖锐的世界问题成为可能、

并且使所有会员国，不论其大小和发展程度，都能对联合国的发展和对世界上的基本改变发挥更大的影响。

南斯拉夫同其它不结盟国家对不断加强联合国的工作和效率给予特别的注意。不结盟国家不断在联合国范围内致力于它的民主化工作，并使它适应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它们不希望对抗，它们也不希望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但是它们赞成良好的关系，使所有国家均能参加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法，并为此作出贡献，尽管仍有朝向保存不合时宜的依赖和剥削关系的趋势存在。

联合国一直是一个活的机体。它反映世界的变化，并且以它的方式参加有利于一切国家和人民的自由、独立、平等和没有阻碍的发展的国际关系的进步过程。联合国遭遇着来自各种势力的抗拒，企图破坏它的信誉、减少它的影响。所谓的信用危机是人为鼓动出来的。一般所接受的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间的相互依赖表现在共同寻找现有国际问题的公正解决上，从而导致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

说到我们对联合国前途的看法，正当它存在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当然不存幻想认为我们的目标能够轻易而没有相当困难地达到。但是，我们深信，联合国今天基本上是方向正确的，并且通过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找到符合国际社会全面利益的解决方法。

最后，我国代表团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只要通过适当的决定，也就是沿着下列方向作出具体的贡献，就能实现它的任务：执行现有的决定以除掉主要的危险点；采取具体的行动以解放仍在殖民和种族主义者控制下的人民；在整个裁军领域中采取明确果断的政治行动；通过联合国整个系统的适时参与，以确保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议得以实行；把缓和紧张的过程扩大到一切地理区域和国际关系方面；确保一切与全体国际社会的利益有关的重要国际问题都能在联合国内解决，或与它保持密切联系。

假如本届会议沿着这些主要方向取得了进展，我们深信建设性合作的气氛将能维持下去，从而能使我们解决联合国所面对的那些问题。

菲舍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愿借此机会重新祝贺我们的主席当选任他的崇高的职位。同时，我希望对杰出的秘书长的考虑周到的工作表示满意。我诚挚地祝愿这两位先生在执行其责任重大的任务时得到成功。

国际关系上的显著变化是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特色。在过去一年内，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彼此和平共存的思想得到了进展。国际协定和承诺使它成为既强大又有约束力的思想。这使世界的人民感到宽慰并对他们的前途充满希望。

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庆祝联合国组织创立三十周年。这两项庆祝都强而有力地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安全。各国人民通过战斗与流血，赢得在安全与和平中生活的权利。建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一直是联合国的指导原则。

事实证明这也是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最高宗旨。在自纳粹主义得到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重申它致力于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遗志，保证不但要尽力维护并且要尽力促进几经辛苦才取得的成果。

当然，我们距离从人类生活中永远消除战争的日子还很远。我们对此不存幻想。但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当一切关心和平的人民都在坚定一贯的行动中团结一致的时候，反对缓和的人便越来越难侵犯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联合国也能够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作出有效的贡献。我们认为，这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有两件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上的缓和正在国际关系中增长。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了；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成功地结束。

这两件事都有利于世界政治。越南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作出重大的牺牲，保卫了他们的社会和民族自主的权利，并且战胜了外来干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一向坚定地站在越南人民的一方，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和所有爱好正义与和平的力量也是如此。英勇的越南人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有权利立刻在平等地位上参加联合国。任何阻挠接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为会员国的障碍，无论借

口是什么，我们都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预期安全理事会能够依照上星期五通过的决议，再度审议并通过两国加入会籍的申请。谁能够认真地怀疑这两个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呢？接纳这些国家，联合国不是加强了它的维持和平任务和鼓励了人民之间的合作吗？

在欧洲，经过长期的危险对抗和冷战后，出现了一项历史性的变化。欧洲大陆和全世界的人民对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期望甚高。他们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各国的边界和主权备受尊重，大家承认和平共存的原则是具有相反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行为准则。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连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为了确保会议的成功，作了一切努力，它是根据它的社会主义宪法而这样做的。

随着赫尔辛基会议文件的通过，我们在走向区域安全体系方面跨出了意义重大的的一步，这是符合依照联合国宪章确保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所通过的指导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十项原则，它们也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准则。

鉴于曾展开了两次战争浩劫的欧洲历史的教训，让我强调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不但对欧洲大陆的人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对一般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来说也是有关的。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会议能够顺利地进行并且完满地结束，答案就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并承诺以所有欧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为基础来进行会议。理智与现实主义战胜了危险的幻想。

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在会议的最后文件上面签字的时候，集体地担承了遵守不干涉其它国家内政的国际法律原则。这项承诺有待加强。在葡萄牙发生的事件，使大家非得强烈坚持这一项原则不可。任何阻挠葡萄牙人民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企图，只会有利于法西斯和其它反动力量。

我们很感兴趣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其年度报告导

言里面对赫尔辛基会议成果的赞扬。我们同意其结论，主张联合国以此为依据，把缓和的过程扩展到其它的大洲。欧洲缓和的果实必需造福所有的人民。

为使缓和不可倒转，必须把它扩展并给予物质内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军备限制和裁军是最为重要的。越来越明显，军备竞赛是与发展各国间的有利关系相冲突的。今天，大多数国家认识到军备限制和裁军是主要和最切题的任务。政治上的缓和迫切需要军事领域的缓和为辅助，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现在得到广泛的赞同。在这一点，我们展望有减少军事对抗以及逐步减少和消灭战争工具的措施。

我们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可以作为基础。地球上广大地区和外层空间都不存有核武器。细菌武器的发展、生产和使用已经被禁止。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已经大为减少。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立刻停止这种试验，就不会再有这种试验。在缔结的各项协定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值得特别强调的。为了确保它得到普遍施行，审议该条约执行情形的会议向对于加入该条约仍感犹豫的国家呼吁。这样将必然大为增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效能。因此，我们欢迎会议呼吁大家遵从该条约规定的义务，在和平利用核子能方面进行合作。这是特指那些向不是该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出口物资与设备的国家而言。

我们认为苏联与美国之间就限制战略性武器和防止核战争而达成的协定是有助于进一步制止军备竞赛的措施。这些协定显示了希望的迹象。不过，核军备限制和裁军是需要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决主张所有国家停止在任何地方的核武器试验。因此，我们欢迎苏联提出缔结一项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最新提议。为了圆满结束一九六三年莫斯科条约所开始，并由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苏联——美国条约作为后继的工作，这是合情合理和最及时之举。制止军备竞赛是目前最适当不过的措施。

我们深信苏联的倡议将会得到大会的支持，尤其是因为它是响应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多年来的要求。今年五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的宣言除

其它事项外，声明：

“会议认为缔结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最重要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苏联政府提议把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我们很重视本论坛所收到的这份协定草案，它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基础，并且是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个问题的适当办法。而且通过苏联提出的提议将会对整个军备限制和裁军过程给予巨大推动力。正是由于这样才能使政治缓和具有物质的内容。

除了全球性的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以外，有关的区域性协定也可以促进军事缓和。因此我们极为注意目前关于中欧相互裁减武装部队和军备的谈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同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正为取得有效的削减而努力。一切有关国家安全不受影响的原则自然是取得互相接受的结果的重要因素。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敦促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并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表示了这种立场。现在是为召开会议而采取实际步骤的时候了。难道不应该就此而立即给予特设委员会指示吗？

苏联和美国向裁军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禁止为了军事和其它与维持国际安全、人类福利和健康不相容的敌对目的而采取足以影响环境和气候的行动的公约草案，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日内瓦裁军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可以审议这项草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将积极推动军备限制和裁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希望看到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与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议得到执行。安全理事会应该就此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这样将必然加强全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安全。在这方面，我要强调一九七〇年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特别是在结束第二次大战后的三十周年里，在第三十届会议，在这个庆祝的会议上，应该作出必不可少的结论。

过去十年中,联合国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事实证明,联合国宪章是反侵略、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以及各国在一切领域平等合作的稳固基础。事实也证明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一致原则是健全的。这样就可以在加强和平与避免核战争方面进行更坦诚的合作。这不就是符合了所有人民的利益吗?

在精神上与字面上履行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机会正在与日俱增。举例来说,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和其它的文件,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因此,现在绝对没有怀疑联合国宪章的必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要求,就是应该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对加强亚洲和平与安全是有帮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关于创造有利条件使朝鲜的停战变为持久和平,并加速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的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之一。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撤走一切以联合国的名义驻在南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以及该决议草案中刊载的其它任务,是解决当前重大问题的必要条件。

中东的局势仍然威胁着国际安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赞成以政治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以色列遵照联合国的决议,完全撤出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就占据的领土;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与人民的安全。

局部的措施——正如目前情况所显示的——是不能够取代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全盘办法的。只要所有各方都正视现实,具有诚意,我们相信继续日内瓦的中东和平会议是最有希望的办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会议是理所当然的事,尤其是因为联合国已经承认该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就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而言,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有关决议,提供了现实而积极的基础。

我们也要在这个论坛中坚决要求在智利恢复人权,释放共产主义者路易斯·科

尔巴兰和在军人政府的监狱和集中营中备受虐待的其它智利爱国者。这个法西斯的军人政府，一贯以恐怖主义对付智利人民，拒绝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进入该国，它一定不能再行漠视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所通过有关智利的各项决议。

十五年以前，随着苏联的倡议，并以宪章为基础，联合国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这就导致在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最后阶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向站在各族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边。它将继续支持他们消灭殖民与种族主义统治最后残余的努力。

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这个维护南部非洲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正在肆意违反联合国的明确意愿，对多数人民进行压迫和恐怖统治。它继续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现在是执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时候。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坎帕拉会议的决定，就是要求对沃尔斯特政权施行全面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并且和它断绝一切关系。所有那些认为继续和扩展与南非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就是对该政权的支持的看法，我们表示同意。停止这种合作是符合人民自决权利的解决南非问题办法的主要先决条件。

我们同情并支持津巴布韦人民反对史密斯政权的正义斗争。安全理事会为对付罗得西亚种族主义统治者而通过的制裁应该得到严格遵守。

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并在葡萄牙民主改革之后，最后的殖民帝国瓦解了。我们满怀喜悦地欢迎和祝贺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和佛得角共和国代表团作为它们国家的代表，它们经过重大的牺牲赢得了独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向与它们的人民有着团结的联系。我们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的代表致以同样热烈的欢迎。我们以最大的同情期待安哥拉在十一月庆祝它的独立，并以主权国家的身分在联合国取得它的地位。

不过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感到忧虑。一些反动势力在外来的支持下，正在破坏解放斗争的成果，把该国置于兄弟相残的战争之中，并破坏了它的领土完整。他们希望该国仍然向跨国公司的新殖民主义势力开放。但是安哥拉人民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解放斗争成果是不容剥夺的。

自殖民枷锁之下取得政治解放是伟大的成就。它在民族自决权利和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有助于所有人民之间的平等合作。同时，这些年青主权国家正面临废除它们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殖民地结构的必要。我们支持它们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所提出的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当要求。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渴望，正在动员着越来越多的人民。在这场斗争里，妇女的作用的增长尤为显著。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国际妇女年会议便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个会议的结果深刻地显示出国际范围上和平与社会进步的相互依存程度。

由于墨西哥会议深入细致的工作，为大会本届会议创造了巩固的讨论基础。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争取充分执行妇女平等权利的多方面问题，并且可以取得足够的成就。

十月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为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国际筹备委员会预料将有两千多名代表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热烈准备依照墨西哥通过的决议，为这件事提供各种方便和一切安排。

我国正在进行我国领导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我们所有的人民正在为取得在工业和农业、科学和技术、教育与文化方面的高度成果而作出巨大的努力。为了这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我们需要和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埃里希·昂纳克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发言中曾说：

“战后使各国关系紧张的所有主要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这也适用于所谓德国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各自独立和具有相反的社会制度的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行使了他们决定

自己社会制度的主权权利，并且不可改变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任何否认这件历史性真理的人将会危害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知道其它各国人民也是同样深切关注国与国之间相互有利的关系，因之也关注维持与加强和平。

我可以保证，在帮助联合国加强和平，进行裁军以及各国人民进行相互有利的合作方面，我们一定与大家合作。

主席：我们刚听完今天下午会议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法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大会各会员国都记得，大会在第二三五三次会议曾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必须以十分钟为限。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乍得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提到法国人质到现在已被蒂比斯蒂叛乱分子拘留十七个月之久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他说：“法国不吝惜地把战争物资送给叛徒”（第二三五九次会议，英文本第73页）。

我要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说清楚，在过去或将来都没有发出或送交这种物资。此外，法国根本没有侵犯乍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图。法国承认恩贾梅纳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希望维持与该政府的友好合作关系。

目前正在为解放被拘在蒂比斯蒂的法国国民而进行的谈判完全是基于人道立场而进行的，因此绝不会违反刚才我提及的原则。

我重复说根本没有提供武器的事情存在。此外，我希望强调指出，如果目前谈判成功的话，第三者将可以证明法国坚守承诺的证据是无容置疑的。

下午六时三十分散会